

國父孫中山先生傳

中華民國五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出版

國父孫中山先生傳（全一冊）

主編者：中華民國各界紀念國父百年誕辰籌備委員會學術論著編纂委員會

編著者：傅 啓 學

校訂者：黃 季 陸

出版者：中華民國各界紀念國父百年誕辰籌備委員會

地址：台北市中山南路十三號

印刷者：上海印刷廠

地址：台北市臨沂街五號



孫文 易行難知

大道之行也天下
為公選賢與能講
信修睦故人不獨親
其親不獨子其子使
老有所終壯有所用
幼有所長矜寡孤
獨廢疾者皆有所

養男有分女有歸
貨惡其棄於地也
不必藏於己力惡其
不出於身也不必為
己是謀閉而不興盜
竊亂賊而不作故外
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孫文



序

黃 壽 陸

今年是國父孫中山先生誕生的一百年，亦是國父民國十四年三月逝世於北平後的四十整年。當國父在世之時，他的美國朋友林百克先生，曾根據與他相處時所體認得來的資料，寫了一本「孫逸仙先生傳記」，這本書正待完成，而中山先生已不幸逝世。迨此書出版已是在他逝世之後。林氏在書中所引述的若干關於中山先生口述的童年時代的故事和所經過的重大政治事件，可惜均不獲中山先生親閱而有所增補，然並不因此減少林著「孫逸仙先生傳記」的價值。曾追隨中山先生革命的日本志士宮崎寅藏先生，在二十世紀的初葉，寫成「三十三年落花夢」一書，雖然是以宮崎本人為中心的一本參加中國革命的回憶錄，但此書對於一九〇〇年庚子年以前的中國革命史實，和有關中山先生音容器宇的記載，可以說得上是第一手的材料。尤可貴的是此書曾經中山先生親閱並為之作序，自更值得作為研究中山先生生平的一種參考。目前有關中山先生生前和逝世之後的著作不少，但其中屬於片斷的記述或資料的編排者居多，而一本敘述他的生平及其思想主義的完整的傳記，迄未盡如吾人理想中的予以完成，這實在是一件很足引為遺憾的事。

傳啓學先生本於他多年來的抱負，寫成一部國父傳，訂於本年十一月十二日國父百年誕辰之期出版，這是一個很好的消息和一項值得稱頌的努力。我非常引為榮幸能於此書出版之前，獲得優先閱讀的機會。在書中如像關於材料的分析比較，以及關於追隨中山先生革命的重要人物的事略等項，我認為若以之置於附註內，似較納入正文為簡潔，且可更為詳盡。此外如對年、月、地點史實的考證用力太勤，而未把目前存在的若干史實的爭議並列，加以論斷等，我於這些地方雖然有若干看法的不同，然在行文的方便上著作者自有其苦心，好在這些對於本書價值並無重大的增損。

本書的優點很多，我且舉出其中兩個部分以為說明，也許這些部分是將來易於引起注視的地方。但是歷史是求真實的，歷史有他的時代性，亦有他的現實性，治歷史的人和論斷歷史的人應當有一綜合因果得失的衡量，而不必對現實作過多的顧慮和忌諱；若是忽視歷史的時代性和真實性而不言，甚或歪曲事實，勉為適應，則便根本不成歷史了。譬如書中所述關於中山先生與宋慶

齡女士的相愛與結婚經過，在其他寫作中山先生傳記的人，往往都避諱不言，而此書却為詳細的記述。避諱的原因不外兩點：第一、從舊倫理的觀點，認為中山先生與盧夫人分離而另行結褵，總是一件不好的事；或根本否定此為一種出於道德的行為，而不及計及其在人生的權利幸福上的是非得失，特別是忽視家庭生活對一個獻身人類的偉大人物的需要。第二、基於現實的原因，孫夫人宋慶齡女士目前尚陷身大陸為共黨所利用。從治歷史的觀點來說，勿論孫夫人目前身陷大陸的情景及未來歷史的發展如何，現在似乎均不能遽下結論。而她與中山先生相愛與結婚的經過，却已成為了歷史，既已成為歷史便不能改易；縱然不說，歷史仍然是存在的了。相反的，我們對歷史有忠實的態度，把曲折原委說個明白，便更能使此一歷史的經過表現出當事人物的偉大。我們讀本書對中山先生與宋慶齡女士相愛與結婚的委婉經過後所得的印象，即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因為歷史不僅是使人知道史實的經過是甚麼，而更是要使人知道歷史是如何的產生，及為甚麼纔有這樣的歷史。這樣亦纔是對一個偉大人物最好的衡量。再如本書把中山先生逝世之後，他的生前政敵、朋友和同志對於他的論斷和哀思刊舉出來，使讀者得從各個不同的角度，去瞭解中山先生的偉大，特別是發自他的政敵方面的言論。以上所舉，我認為是本書優點的一個例證，可能亦是易於引起注視的部分，因此我願先為提出介紹。

當民國十四年三月，中山先生在北平逝世的消息傳達廣州後，其時廣東大學（即是後來的中山大學）的一部分教授們正出版一個名叫社會評論的刊物，我和現尚在臺的謝瀛洲先生都是其中主要的撰稿人。我們為悲悼偉大革命導師的逝世，評論社的同入特別會商刊行一期紀念他逝世的專號，把他的生平、思想、主義作一概要的闡述，以為後來寫作他的傳記和研究他的思想主義工作做一個開端。我記得其中「中山先生事略」一文是由我執筆的；「中山先生思想概觀」一文為周佛海所寫，周之見重於戴季陶先生，此文的關係很大；「民族主義」一文為曹四勿先生所寫；「民權主義」一文為謝瀛洲先生的大著；「民生主義」一文則為農學界的一位前輩曾濟寬先生所寫。當時此一紀念專號的籌劃，原本是為了要合力為他寫一本傳記的預備，所以文章的安排，在初便已具備了一些記的輪廓。現在距中山先生逝世已四十年，此一紀念專號固已無從尋得，而大家立志要為他寫一傳記的宏願，特別是我本人，則至今未獲完成，清夜自思，感到十分慚愧與惶悚！尤感到傅啓學先生所著國父傳的適時出版，是值得敬佩的。一個偉大人物的傳記不厭其多，更不能因年代日遠而失去其重要。世界偉大人物如耶穌、華盛頓、林肯、拿破崙的傳記，已出版

的不知有多少，即至今日仍有作者企求發現新的資料、新的論點，而埋頭從事寫作，發掘這些偉大人物的理想，主張和抱負來啓示今人，昭勵來茲。

一個偉大人物傳記的寫作是十分吃力的事，不是過來人將不知其中的艱苦。第一是受了現實環境和條件的限制，不易盡如理想地以表達歷史的真實；第二、治歷史的人最易患一種「近視病」，對距我們愈遠人物的描寫，則只見其影響與貢獻，而忽視其瑕疵；對愈近的人物，則易見其恩怨瑕疵，而忽略其貢獻與偉大；即是將兩者並予考量，由於兩者相互抵減，其偉大之處亦便所餘無多了！

治歷史的人，有三個不可忽視的步驟：一是蒐集資料；二是整理和分析資料；三是處理資料。把這三項工作做得很圓滿，自然可有一部比較完好的歷史或傳記寫出，但問題往往發生在資料的本身，尚須經過一番淨化與錘鍊，即使已屬純可靠的資料，亦只能從中知道這件事是甚麼？而這件事是如何產生的？為甚麼會產生這件事？有時往往亦不易尋出端緒。新聞和其他新興的大眾傳播事業是近代人類一項大的進步，照理新聞應當是現在最好的歷史，但是近代新聞的報導，亦往往有與事實背離的地方。後之人如果純以此為根據，勢將隨之而失去歷史的真實性，自不能盡行採證，而必須加以分析、判斷和求得旁證乃可。近代治歷史的人，鼓勵人寫自傳，或由當事人錄音紀錄，在資料的蒐集方面已較以往為進步，唯一可慮的只是主觀成分每嫌過多，然而對於瞭解一段歷史的如何？與為甚麼？其所及的範圍則有更為廣濶的好處。因此，當事人所述的忠實經過，自仍是一種較為重要的參證。我現在要舉出幾項有關的史料，以說明撰寫國父傳在資料蒐集與採用時的困難，特別是瞭解中山先生偉大的政治風格之不易。自民國十三年二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閉幕之後，根據大會通過的總章，以選舉的方式產生的正式黨部，當以廣州特別市黨部為最早。國民黨員和共產分子間開始短兵相接，亦以廣州特別市黨部成立後更為具體化。在廣州特別市黨部第一屆委員當中，現尚健在的有孫哲生、馬超俊兩先生和我三人，我們三人當然對於當時反對共產份子的經過較為明瞭，可是對於此一段歷史的有關的記載却有若干的出入。據鄒魯先生所編中國國民黨史稿的記載：

「總理在時仍有所嫌，事雖陰達，貌猶陽順。總理亦既覺悟，故總理對於廣州市黨部委員黃季陸、孫科等示以共黨跋扈，應予制裁，故市黨部遵示進行。共產黨因指市黨部為右派，為反動。但市內各黨部應歸市黨部辦理指揮，莫能越級利用也。乃由組

織部設各區黨部區分部聯合會於中央，以達其操縱之術。」

其他類似這樣的記載亦復屢見，茲舉另一部黨史稿中關於此節的原文如下：

「總理在世時，加入本黨的共產黨，雖心懷叵測，而貌似順從，被總理曾經發現過，故對廣州市黨部執行委員黃季陸等，即給以指示，大意謂共產黨跋扈應予制裁，市黨部即遵照進行。」

以上兩類記載，與當時事實雖然大致無誤，但唯一的出入之點，亦是最重要的出入之點，則是認為廣州市黨部的反共工作，是由總理之指示以對付共產黨之跋扈，而特予制裁防止。總理的內心是否如此，為另一問題，據我所知，總理確未曾對我們對此有過何種明顯的指示。因為：

一、以總理平素領導的作風，光明正大，不尚權術，不會表面是一套，而內心又是另一套。

二、當時共產黨陰謀詭計雖已略露，但在整個容共的大計上，尚不如想像之嚴重。

三、當時的容共實基於內外革命形勢的一種需要，取舍之權，操之於本黨，如果認為共黨當予制裁，去之可也。當不會採此迂迴不當之手段，導致不必要之內部紛擾，與明和而暗鬧的壞作風。中山先生於民國十二年十二月三日親批鄧澤如等彈劾共產黨書即曾有云：「共產黨既參加吾黨，自應與吾黨一致動作；如不服從吾黨，我亦必棄之。」的話可為證明。亦可見中山先生決策的正大堅定。

另有一事亦可作一旁證來說明中山先生立身行事的光明正大：

在民國八年時，曾有一位名叫王鼎的同志寫信給中山先生，打算從事暗殺，中山先生批答云：「代答，以暗殺一舉，先生向不贊成，在前清時代亦阻同志行此，以天下之惡人不勝殺也。道在我有正大之主張，積極之推行，則惡人自然消滅，為目的不待於暗殺也。」觀此便可知道中山先生雖在極度困難的革命時期中，也不輕於放棄自己所守的原則，以不正當的權謀或詐術，不擇手段以求成功。儘管有人認此為他不能及身見到革命成功的原因，在我的看法，這正是他偉大人格的表现；因為中山先生視革命為當然不斷之進化，且時綜其全體，以為衡量，故以為革命只有成功，而無所謂失敗，其樂觀由深切之認識而來，固無所用其權詐，為目的而不擇手段了！

上面所舉的這一史料上的出入，雖然涉及的地方不甚重要，但由此可見尋求史料的真實之不易，如果我不是當時當事人之一，這一史料上的出入，亦將無從知道。對於中山先生偉大的政治風格，亦將瞭解不够。更何況，有時單憑當事人的自述，亦難免有因說之不詳而致與事實有所出入之處。舉例來說，如像中山先生在孫文學說有志竟成一章中曾說：

「武昌起義之前夕，予適行抵美國哥羅拉多省之典華城，十餘日前在途中已接到黃克強在香港發來一電，因行李先運送至此地，而密電碼則置於其中，故途上無由譯之。是夕抵埠，乃由行李檢出密碼，而譯克強之電。其文曰：『居正從武昌到港，報告新軍必動，請速匯款應急。』等語」。照常情而論，此一出於中山先生之自述，應無可置疑，然參考其他有關的史料，則發現與事實仍有不盡相符的地方。

一、黃克強先生辛亥年十月五日（武昌起義前五日）寫給馮自由先生的信中曾說：「鄂代表居正由滬派入來云，新軍自廣州之役預備起事，其運動之進步甚速……」可見到港的不是居正先生，而是另有其人。

二、居正先生在所著辛亥劄記一書中，對此事有更詳細的記述：「余偕楊（按為楊玉如）赴滬後，初訪宋遜初於民立報，次訪陳英士於馬霍路，再訪譚石屏於北四川路，報告湖北近事，並請英士代購手槍，由湖北携來一千元交之，英士慨允辦理。連日在英士寓所，召集上海機關部會議，決定南京上海同時發動。由余詳述武漢及長江一帶事實，函報香港，託呂天民携往，請黃克強速來，宋遜初、譚石屏準備同時赴漢。」這一段文字不但把他到上海後的活動情形交代得很清楚，並連派到香港去報告武昌近情的是呂天民（號志伊）先生，亦敘明了。

依據這兩項記載，此一黃克強先生向中山先生報告革命近情的電文似應為：「居正從武昌到滬，派呂天民到港，報告新軍必動，請速匯款應急。」纔能與事實完全吻合。這一出入之發生，或由於中山先生著述孫文學說有志竟成一章時，與辛亥年已有八年之隔，在八年以後來追敘當時的一件電報原文，自難於完全相符。抑或是由於克強先生發電時省略字數所致，就不得而知了。好在這一出入之發生，於史實真象並無重大的關係。我之所以在上面要提到有關史料出入的問題，旨在說明追尋史料的真實性之困難，而不是說這一類的出入，就會如何重大的影響了史料的真實。

中山先生的偉大，真是巍巍乎，蕩蕩乎，令我們無窮的景仰。自他逝世至今已四十年，在他生前和死後，中外人士為他寫作

傳記的人為數至多，這正說明他思想和主義之博大與精深，人格與風儀之源遠而流長。愈是世界的進步和變化劇烈，愈顯出其人格思想主義影響於後世之巨大。一個偉大人物對人類的貢獻和影響，正如一處巨大的寶藏，需要時纔知道其用之不竭，發掘時纔知道其取之不盡。我相信中山先生為人類所樹立的楷範，為人類所指示的方向，必將隨世界的演進而愈益顯現其光輝。一部至真、至善、至美的國父傳記，或將仍有待於今後演變中的世界予以印證充實而完成。傳啟學先生於國父百年誕辰時將其所著的國父傳出版，便是一個良好的起點，是十分值得我們稱頌的。

自序

民國五十三年五月，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在南投草屯開會，討論編纂計劃，分配工作時，羅志希先生謂：全國各界對國父百年誕辰，將作大規模紀念，出版紀念書刊，不能不事先準備，擬請余擔任編著國父孫中山先生傳，在座同志一致贊成。余當場聲明，恐能力不克勝任，俟詳細考慮後，再行答覆。當晚余仔細考慮：余民國十二年在北京大學入黨，為國父信徒已四十一年，從十五年起，在北京大中公學任教時，已擔任公民一課，開始宣傳三民主義。二十七年任貴陽大夏大學任政治系教授時，曾擔任三民主義一課。三十九年任臺大政治系教授時，亦曾主持三民主義課程，對國父思想及歷史，自信已有相當研究。欲撰國父傳記，對於近百年中國政治史、外交史，亦必須有相當研究，始不至有重大錯誤。余在大夏任教時，曾講授中國政治史六年；在臺大任教時，講授中國外交史亦有十年，並已出版中國外交史一書，自信對中國近百年政治史，外交史，尚有心得。去年余之年齡業已六十有二，人生已近暮年，不於身體尚未衰弱之時，為生平崇敬之國父，竭盡棉薄，於情於理，似均未合；遂決定負責編著。次日面告志希先生，允以勉力擔任。

余編著國父傳記，預定五十萬字，在國父百年誕辰前出版，從搜集資料，至寫作完成付印，僅有十五個月時間。返臺北後，決定以全力寫作，即向臺大申請休假一年，同時開始搜集資料；因余已繼續任教十三年，尚未休假，有申請休假之優先權利也。九月，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給予甲種研究補助金，余為集中力量寫作，亦聲請放棄。

余對國父全集，曾閱讀數次，已知國父歷史散見於演講函電者甚多，六月下旬學校課程結束後，即開始閱讀演講函電，分時分類作成筆記，代替研究卡片之用，因係為個人準備，採取較簡便之方法也。演講函電讀畢後，開始閱讀中外人士所寫國父傳記。

中文傳記得讀者，共有六種：一、胡去非編：總理事略，係二十六年十月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館出版。二、蔣星德編著：國父孫中山先生傳，係三十四年六月重慶正中書局出版。三、鄧慕韓著：孫中山先生傳記，原稿存黨史會史料庫，現已選入革命先烈

先進詩文選集。四、黃光學著：國父孫中山本紀，係國防部總政治部四十年出版。五、王昭然編著：國父孫中山先生新傳，係四十八年四月作者自行出版。六、陳健夫編著：國父全傳，係自由太平洋文化事業公司五十三年九月出版。

英文傳記得聞者，共有四種。一、康德黎 (James Cantlie) 著：孫逸仙與新中國 (Sun yat sen and The Awakening of China)，係民國元年在倫敦出版，十九年鄭啓中、陳鶴侶譯為中文，在上海民智書局出版。二、林百克 (Paul M. Linbarger) 著：孫逸仙傳記 (Sun yat sen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於十四年國父逝世後在紐約出版，三十年十二月徐植仁譯為中文，在重慶文化服務社出版。三、雷脫里克 (Bishop Henry B. Restarick) 著：孫逸仙傳 (Sun yat sen)，一九三一年在美國耶魯大學 (Yale University Press) 出版。四、馬丁 (Bernard Martin) 著：孫逸仙傳 (A Biography of Sun yat sen)，係一九四九年，在倫敦出版。三、四兩書均存於黨史會史料庫，未有中文譯本。

日文傳記得讀者，僅有兩種。一、鈴江言一著：孫文傳，一九三一年初版，一九五〇年在日本東京重印。二、小田嶽夫著：孫文，一九五三年在日本東京出版。此兩書存於中央黨部圖書館。

余讀畢上述中、英、日文傳記後，信心為之大增，非因各書資料不豐，有若干缺點，實因余編著較晚，可取諸書之長，以為我用也。余續讀陳少白口述：興中會革命史要；鄒海濱著：中國國民黨史略、中國國民黨史稿；馮自由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革命逸史；張其珣著：黨史概要；羅家倫著：六十年來之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凡可引用資料，均分別記入筆記中，以備查考。各書大致讀畢，將材料整理後，擬定傳記大綱，於去歲十月初開始編著。其他參考書籍或資料，約在二百種以上，均分別見於附註。

寫畢數章之後，始知黨史會國父年譜初稿幫助之大，因編著歷史或傳記，時間一定要清楚，決不能稍涉含糊。若時間不清，前後顛倒，書之價值，必為減低。黨史會年譜初稿出版後，有人批評若干錯誤；不知對一件史實之記載，各書並不完全相同；若引證甲之記載，而批評他人引證乙記載之錯誤，即不免陷入偏見。敘述傳記事實，必須有所根據，決不能憑空撰述；至於根據資料是否確實，則在作者之考訂與判斷。余編著時，每述一記載各異之史實，或遇記載極簡單之史實，至少費時半日或數日，以作考訂，茲舉三例於次。

一、關於熊成基烈士在哈爾濱被捕後之供詞，鄒海濱黨史稿記載之全文，與馮自由開國前革命史之記載，完全不同；經詳加研究後，始採用馮自由之記載，僅在附註中註明資料之來源。二、關於國父一九〇五年冬赴歐，見於鄧慕韓所著傳記，但何日赴歐？赴歐有何任務？則未述明。余曾請教於對黨史有研究之同志，或稱是時並未赴歐，或稱尚待研究。後閱宋教仁日記，證實國父是時確曾赴歐，此段始得定稿。三、關於國父與宋慶齡女士結婚日期，有不同之三說：國父年譜長編初稿、胡去非總理事略，皆稱在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林百克稱，在四年十月二十五日；日人小田嶽夫則稱，在三年十月二十五日。余就各種資料研究，判斷在三年冬季；而黨史會同人中，有根據其他資料，認為在四年十月二十五日者。後羅志希先生請友人在日本外交部查閱有關檔案，始證實為三年十月二十五日。由上舉三例，可知余編著時遭遇困難之一斑。

本書採用陽曆，有必妥時，則附以陰曆，以便查考。國父在民報週年紀念演講，有載為十二月二日者，有載為十月十七日者，後請友人查萬年曆，始知十二月二日係陽曆，十月十七日係陰曆，兩種記載均無錯誤，不過係陽曆陰曆之分而已。民國開國前著作敘述日期者，多用陰曆，故余雖用陽曆，有時亦難免採用陰曆。

本書文體有時用文言文，有時用語體文；因引證資料有文言文及語體文也。引證資料係文言文者，多續以文言文；其為語體文者，則多續以語體文。

本書敘述與國父有關人士，僅就其當時表現而言，未顧及其民國十四年以後之行為。如對汪精衛即有好評，因在國父逝世之後，汪始漸入迷途；而在國父生前，汪之表現確係良好，作者不能否定歷史事實也。對黃克強、宋教仁、章太炎諸先生，作者均秉筆直書，決不故作褒貶之詞。

本書敘述事實，多引用國父著作、演講、及函電，但為簡單敘述，多係節錄，並不照錄原文。如「上李鴻章書」係萬言書，僅節錄約九百字。如「軍人精神教育」有二萬餘字，僅節錄約二千字。又如「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有八千餘字，僅節錄約八百字。節錄文字均以闡明一項主張，或敘述一件事實為限，讀者如願閱讀全文，自可在全集內查閱。

關於國父歷史資料，黨史會史料庫早已公開，有關人士均可查閱抄錄。多數重要資料，已發表於國父年譜、革命文獻，及開國五十年文獻。作者曾至南投草屯史料庫，調閱資料六百件以上；但查閱之下，百分之九十五均已發表。故在附註中，關於資料

已發表者，即註明引用書籍；未經發表者，始註明出自史料庫。

國父傳記，包括國父革命史、思想史、生活史；兼及中國國民黨黨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外交史；材料豐富，範圍廣擴。作者在此十五個月中，每日工作平均在八小時以上，星期例假，亦不例外，希望能編一較完備之傳記，使讀者對於國父有一深刻之認識。但作者觀察未周，能力有限，雖盡極大之努力，忽略及錯誤之處，必所難免，敬希讀者不吝指教，俾有改正機會。

傳 啓 學 中華民國五十四年十月一日於臺北

國父孫中山先生傳目錄

黃序

自序

第一章 誕生時的時代背景

第一節 當時國內情形

(一) 清廷消滅民族主義思想

(二) 民族主義思想再被摧殘

(三) 中國已受不平等條約束縛

第二節 當時世界情形

(一) 政治的情形

(二) 經濟的情形

第二章 家世源流

第一節 孫氏南遷經過.....七

第二節 平民的家庭.....八

第三章 少年時代.....一〇

第一節 誕生的時間和地點.....一〇

第二節 幼年的生活.....一一

(一) 鄉童的生活.....一一

(二) 研究的願望.....一二

(三) 善良的心情.....一三

(四) 俠義的心腸.....一三

第四章 到檀香山.....一五

第一節 侍母至檀香山.....一五

(一) 大哥海外歸來.....一五

(二) 旅途中的感觸.....一六

(三) 初到檀香山的感觸.....一七

第二節 在檀香山的生活……………一七

(一) 在商店習業……………一七

(二) 在學校的生活……………一八

(三) 由檀香山返國……………一九

第五章 回國後二年生活……………二〇

第一節 回鄉的一年……………二〇

(一) 稅收吏役的騷擾……………二〇

(二) 回鄉後批評弊政……………二一

(三) 被迫離開家鄉……………二二

第二節 生活轉變的一年……………二二

(一) 受基督教洗禮……………二二

(二) 與盧夫人結婚……………二三

(三) 交還大哥的財產……………二三

(四) 決心傾覆清廷，創立民國……………二四

第六章 廣州博濟醫院學醫……………二五